

世 界 思 想 家 译 丛

主编：张世英 赵敦华

ON MARX
马克思

[美] 温迪·林恩·李 著

WENDY LYNNE LEE



ZHONGHUA BOOK COMPANY

中华书局

THOMSON

WADSWORTH

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

世界思想家译丛

主编：张世英 赵敦华

On Marx

马克思

[美] 温迪·林恩·李 著

陈文庆 译



中华书局

THOMSON



WADSWORTH

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

On Marx, ISBN 981 - 243 - 562 - x

First published in 2002 by Wadsworth, a division of Thomson Learning,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translation of the edition by Thomson Learning.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express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omson Learning and Zhong Hua Book Co..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美)李著;陈文庆译. —北京:中华书局, 2002

(世界思想家译丛)

ISBN 7 - 101 - 03654 - 6

I . 马… II . ①李…②陈… III .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IV . B0 - 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1958 号

书 名	马克思
丛 书 名	世界思想家译丛
主 编	张世英 赵敦华
原 著 者	[美]温迪·林恩·李
译 者	陈文庆
责任编辑	江绪林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2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4 ³ / ₈ 字数 89 千字
印 数	1 - 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 - 101 - 03654 - 6/B · 365
定 价	8.00 元

目 录

序.....	1
1.人性/类存在物	5
2.劳动和异化	28
3.作为历史研究法的辩证法	58
4.共产主义革命	78
5.马克思主义与对压迫的批判	98
6.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	118
参考书目	127

序

本书旨在让初学者熟悉哲学家马克思著作中一些核心的观念和论证。无论在生前还是死后，马克思都被认为是一个革命的思想家；他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影响，他的历史观，他关于人性和创造性劳动的概念，以及他关于理论和实践之关系的观点，都超出了学院哲学的范围而延伸到经济学、人类学、政治理论、社会学和伦理学等领域。马克思探究的目的在于激起反对经济压迫的不公正的革命。没有一个思想家比他更敏锐地察觉到了，点燃一场成功的革命所需要的集体力量是如何受到关于那些条件——人类生活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它使这种探究本身成为可能——的知识的制约。

我的假想之一就是，我的读者是一个工人：无论他从事的是家务劳动，还是公共劳动；无论他的薪酬良好、工薪不足，还是根本没有报酬；无论他的工作条件是安全的，还是不安全的；无论他有没有机会获得健康保险、儿童保险，或养老保险；无论他是年轻人、中年人或老年人，是白领还是蓝领；无论他有没有足够的闲暇阅读……我希望能激发我的读者作为无产

阶级的一员来思考她或他自己：无产阶级是工人的团体，为了它，正义要求人们战胜资本主义——它被理解为系统地蹂躏人类最珍贵之物的一种制度；我们人类最珍贵的东西就是，将感性物质世界改造成为人类——它将自身理解为意识到它自身价值的自然——的形象的天赋才能。

作为哲学误解的目标和政治替罪羊，20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几乎是一种共产主义的同义词；这种共产主义以其暴行和失败、焚烧书籍、军事袭击、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酷刑和谋杀等行为而闻名。这些行为与马克思哲学的同情精神是如此背道而驰，以致人们怀疑与这些暴虐的人权践踏相联系的马克思是否是我们在此应该发掘的人类潜能的代表者。许多人认为，他的哲学如果不是一种邪恶的哲学，也至少是一种判断有误的哲学。我们最容易想到的、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灭亡相联系的意象是：柏林墙的倒塌、铁托死后南斯拉夫的突然崩溃和前苏联的解体。然而，我的目的是想说明，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马克思被误解了；如果流行的神话包围着马克思主义，我们就消除一些对他的毁谤。在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最近运用时，我们发现，他深刻的乐观主义的人性观念、他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对人性的影响的彻底批判，在今天，仍然与马克思生前一样充满活力，并与我们息息相关。撇开他那些被滥用的思想，本质上马克思仍然是一个植根于启蒙传统的人文主义哲学家；他的目标与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幸福”(eudaimonia)或人类的“自我实现”相关联，就如我们的愿望就是幸福和美好生活一样。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我们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二者都将为读者提供对马克思的认

识和批判的洞见,当然这种批判与马克思卓著的声誉相比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不同的、有时相互冲突的视角为读者提供了评估马克思的思想与分析当代问题之间的相关性的机会。比如,当马克思关于经济压迫的分析被应用到其他形式的压迫中时,是否仍然有用呢?马克思主义能够照亮除“阶级主义”之外的其他各种“主义”吗?种族主义?异性主义?马克思关于人是动物的一个种类的观念对环境伦理学有什么意义呢?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能否应用到对全球经济趋势的一种更为敏锐的理解?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一些问题,以证明马克思与一个 21 世纪的读者有关系。

这种研究途径有众多优点。首先,它着重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概念重要而持久的方面;第二,它在某些方面有助于消除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或者马克思的思想在当代政治分析和经济分析中已经不再有用的观点;第三,不管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被应用到女权主义和环境主义所面临的问题时显得有多么遥远,看看这些论题是如何能够被追溯到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劳动及其后果的批判,是很有教益的。看看无所不在的经济分层是如何贯穿于人类存在的经纬之中,也是有启发意义的。然而,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生存的每一个方面:食物、医疗、交通、性、隐私等都被自由市场所支配,没有人能够摆脱这个市场的影响——无论是垂髫幼童,还是不再直接从事某种形式的雇佣劳动的垂垂老者;无论是富贵人家,还是最无可剥削的白痴。

在此,我的目的是解释性和批判性的,因为我的目标不仅是给读者提供一种对马克思基本思想的可靠理解,而且还提供它与当代经济、政治、伦理问题的相关性的示例。我希望邀

请读者用一种与马克思的哲学构想相一致的方式来“提炼”马克思主义,这种构想的目的是不仅是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即要通过深思熟虑的和集体性的行动来提升这个世界。在这里,我既是辩护者,也是批判者;我将自己定位为一名导游,任务是描画出通向马克思的哲学胜地的一条路线,沿途指出可能遇到的荆棘和乱石、危险和希望。

本着这样的精神,我不掩饰我受其他思想,尤其是语言学和心灵哲学、女权主义、环境主义,以及另一个著名哲学家即维特根斯坦的后期著作的影响,我也并不认为自己已经穷尽了马克思,或者已经呈现了马克思。由于注重知识目标,我首先把马克思作为一个哲学家而不是一个政治鼓动家或经济学家——尽管它们也是很重要的——来看待;其次,我主要关注的是马克思的早期和中期著作,而不是其后期著作;最后,如果不承认另一个哲学家对马克思的深刻影响,那是不明智的。他就是恩格斯,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家庭的分析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旨趣的一些重要方面。在本书中,他得到了恰当的关注。如果不是因为表达上的麻烦,人们可以正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看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事业。考虑到要简洁清楚地表达,我自己没有选择这条道路。我的计划是适度的,其目的是激发读者追寻自己的哲学问题,严肃地悬置偏见并且批判性地审查伟大思想。

1

人性/类存在物

类存在物

人们可以用各种同样有效的方法来开始关于马克思的研究。比如,从介绍黑格尔或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开始,或者,以马克思的生平和著作年表的方式开始。不过,我自己选择了一种更为主题化的方式来开始这种研究,希望读者直接与马克思的观念相接触。因此,我们通过讨论一个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主题,即资本主义的兴起和革命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马克思关于人性的概念或他所谓的类存在物的概念,来开始我们的研究。

由于西方启蒙的人文主义的启发和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也由于达尔文对自然选择的论证,马克思关于人是类存在物的概念代表了对早期的人性观念的一种拒斥;早期的人性观念是静止的、二元论的,它倾向于这样一种认识,即人是动物

的一个种类,它与其他感性生物一样,有现实的肉体需要,能承受痛苦,度过有限的一生,而最终死去。与人们常常归之于他的悲观主义相反,马克思的核心观点是这样一种认识,即人类不能被定义为一种不变的、给定的类成员之物,而毋宁必须被辩证地构想为一演进的作品或进程。它与自然的关系既是物质的又是理性的,既是物理的又是心理的。

“辩证”一词的轨迹可以追溯到西方传统最早有记载的时候,任何被描述为辩证的过程是这样一个过程:在其中,进步或变化是通过克服一系列原有条件而发生的,而这些条件自身也是克服此前的系列条件的产物,如此以至无穷。断言类存在物是辩证的,就是断言它是一种通过克服一些物质条件而不断进步的产物,通过这种克服过程,变化对于人类成为可能。

这是一种提供人类生存的物质条件的“持续交换”,这种辩证关系同样为人类的精神事业——它使人类成为一种独一无二的类存在物——提供了资料。马克思说:“思想、观念和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换,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德意志意识形态》,47)”

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在他把整个自然界——首先就它是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而言,其次就它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而言——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来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形影不离的身体。说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不可分离,这就等于说,自然

界同自己本身不可分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12)

正是基于环境资源即自然界在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上都具体体现于人类生存活动之中的事实,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马克思本人的一生,提供了什么是他所意指的类存在物的范例。马克思一生(1818—1883年)的绝大部分时间生活于远离德国本土的流放之中,在贫困的边缘维持着一个家庭,经济上依赖于他的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几乎不可能不意识到在满足基本需要方面许多人所面临的斗争。他辉煌的然而很少得到补偿的精神产品的情形,在他人格的纯粹热忱之中得到体现。要追溯这些并不困难。比如,马克思的传记作家艾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评论说:

生活于一个充满敌意的、庸俗的世界的感觉——这种感觉也许被他对于自己是一个犹太人的事实的潜在厌恶所强化——增加了他天性中的粗暴和攻击性,产生了民众想像中的可怕形象。但是,如果说他在公众场合的态度是傲慢无礼的,那么,在由他的家庭和朋友所组成的私人圈子里——在其中他感到彻底的安全——他是体贴周到而又温文尔雅的;他的婚姻不可谓不幸福,他与他的孩子们热情亲密,他对他的终身好友和合作者恩格斯待以独特的忠诚和挚爱——即使他的敌人也被他的人格的力量和热切所吸引……(伯林,4)

作为一个革命家和作家,在离开德国并且最终离开法国去英国的流放过程中,马克思反对经济不公正的力量无疑被他为维持他自己以及他的家庭的生存的斗争所制约。在经常受到强烈指责的文章中,马克思表明经济生活就是类存在物的生

活;因为它是满足物质需要,因而也是满足一切其他需要的生活。马克思人格的力量与激烈都是有机的,即是说,这是从他早期的哲学经验中成长起来的,这些哲学经验尤其包括对黑格尔的回应,对于理论建构与人类生活的物质条件的关联的认识以及他所从事的理智论战的重要时刻——马克思把论敌视为“傻瓜或马屁精”,因为他们看不到资本主义对于人类发展的含义(伯林,3)。

由于我们绝大多数人现在已经不再是原始的狩猎人、觅食者、劫掠者或采集者,人们可以在这儿提出反对说,我们已经不再是自然的一部分了,至少在马克思的描述可以引伸出的史前形象的意义上已不再是了。但是,这种推理明显是错误的,如同我们认为,资本家的事业——比如我们中的每一位都会时常出入的塔克·贝尔(Taco Bell)、瑞德·罗伯斯特(Red Lobster)或比萨屋(Pizza Hut)等企业——会因为缺少我们的合作而不能、也不会成功一样。无论如何,马克思的观点,不仅仅是说我们依赖于自然,而且还指这种依赖的特征是辩证的。即是说,我们是一种克服和同化物质世界的过程的产物,通过这种克服和同化,我们将自己界定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存在。换句话说,我们不仅仅是塔克·素普瑞(Taco Supreme)或者罗伯斯特·菲斯特(Lobster Fest),而且还是消费者——对消费者来说,这些产品代表了我们价值评价的方式。

马克思的类存在物的观念不仅仅是辩证的,而且还是特殊的生态学的,它使理性——把人类从非人类的生命中区别出来的条件——关联到我们实现物质需求的方式。不像非人类的生物,非人生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它就是“它这种生命活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13),人类

“则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13),“人”:

在实践中创造一个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的自然界,这是人作为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亦即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当作自己的本质来对待,或者说把自己本身当作类的存在物来对待)的自我确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13)

对马克思本人来说,这里意指的是一个劳作的、“在伦敦的相对默默无闻中,在他的大英博物馆的书桌和书房中”中度过的生命。无论是对他的追随者,还是对他的反对者来说,他的确使他自己变成了这样一个对象,一个革命理想和灵感的隐喻(伯林,1—2)。在其成年生命中,马克思不仅在他的著作中,而且还与他那个时代的无数其他作家、政治活动家和革命家的交流中创造了一个对象世界(伯林,118)。

这一点在他的著作和生活中都得到例证:对马克思来说,人类独特的、区别于非人类的生物类的存在,不仅表现在实现需要的能力上,而且表现在客观化“自然”上——这个自然被占有为劳作或劳动的物质条件。通过这种劳动,类生命能够成为人的生命:

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在实践中、在现实中使自己二重化,并且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14)

人的意识不是一种直接性——非人的生物的意识是一种完全的直接性,人类通过创造性劳动(实践)预期一种未来,它本身是一种具体化于对象的生产之中的人类自我意识的表

现。“正如个体要表达他们的生命”，马克思写道，“人类也是”（《德意志意识形态》，42）。通过创造一个对象世界：精神的、音乐的、艺术的、建筑的，一句话，人类把他们自己创造为意向、思考和直观的对象。通过一个既是辩证的又是生态的过程，一个人成为学者、音乐家、画家、建筑家、作家。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类存在物，通过将它的物质条件对象化——通过使它的物质条件成为它自己的形象，它克服或者超越自己。因为这就是具有一个世界的含义，即生活于一种过去、现在和将来——体现在创造性劳动的持存的对象——之中。

历史性和自由

这样，马克思用人的本质的历史性，即用人类在实践的兴趣中理解和占有类生活的物质条件的独特能力，或者，用被辩证地构想的创造性劳动——通过它，需要的直接性被与所创造对象的密切关联超越了——来表征人的类生活的特性。的确，在人的自我复制的欲望预设了他们的持续生存的意义上，这样一种对象的价值直接来源于他们的历史性的（而不仅仅是时间性的）特征。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看来，历史性本身，是由使创造性劳动成为可能的物质条件，进而，是由辩证的唯物主义——它使人成为类存在物——决定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78—82）。通过创造在外在世界中持存的人类自身的形象，我们不仅复制自我，而且还推进了人格的发展；这种人类的人格，被认为是具体表现了经验的、理性的和在物质条件的限度之内的自由。

由此视角来看，关于精神—肉体的二元论观念根本就站

不住脚了。因为,无论“精神”是在什么程度上被设想为非物质的、不可分的和不可毁灭的,它都只能自由飞翔于物质限度之内,物质决定了创造性劳动的可能性。换句话说,这种二元论不能满足使人的意识得到发展,或者,使人从非人的存在中区别出来成为可能的最小条件。因为这样一个二元论的“精神”不可能是任何东西:首先,因为唯物主义排除了非物质的现象和实体的存在;其次,因为意识是类的成员之间以及与他们们的自然、社会和经济环境之间的物质关系发展的产物。

因此,由上所述,精神—肉体的二元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不合逻辑的,因为它在尚没有人能够存在的地方假设了一个(自我)意识,因而它也严重地将实践的产物和实现这种实践的条件混淆起来了。由于将意识自身误认为是使意识成为可能的劳动,二元论不能提供一种实现“生命过程”的通路,这种“生命过程”独特地决定了人类存在的特性。马克思写道,“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德意志意识形态》,47)。换句话说,意识是被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生产所决定的,即被“物质资料生产本身”所决定的,马克思认为,“物质资料生产本身”构成人的“第一个历史行动”(《德意志意识形态》,48)。

正是以这一方式,马克思将黑格尔自己嗜好的二元论“倒置过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73—193)。因为黑格尔坚持认为,只有通过意识对精神或者形而上的真理——黑格尔称其为“绝对”——的追求,对自由的探求才能得到实现,而马克思则表明,自由远不是一个给定的内在的“精神”,自由标识了一种实践的成就:

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

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想像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德意志意识形态》,47)

换句话说,自由,不是从物质制约中的解放,而毋宁是对自我对象化的追求的自由;这种对象化体现在创造性的实践之中,而个体的历史性和人民的历史都发源于这种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之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79—182)。马克思认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12)。

由此看来,将生命的物质条件看作它的阻碍和限制的观点,是对生命的一种误解。因为“生命过程”是“有血有肉”的现象,它不仅涉及到人类存在与自然的交换,而且还涉及到人类个体成员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既不是机械的,也不是任意发生的;而是在一个人将自己认作普遍和自由的存在物的意义上,他们确定的一种物质的辩证的交换关系;人作为普遍的自由的存在物,他本身以对他人——他人自己的自我意识经历了一种类似的过程——的承认为中介。

尽管马克思本人关于这种关系的例子或许能够更有力地说明他在大英博物馆中写成的充满讥讽的孤愤之作,我还是要选择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在具体化了的辩证法中既能比喻地、也能实在地作很好的说明。成为一个母亲,不仅可以被描

述为一个生产族类的生物过程,而且还可以被看作现象地或者经验地超越自我的过程,这个自我可以被看作一个为了与“母亲”的自我的概念合并的单纯实体。孩子自身可以被看作是物质的,是通过怀孕、分娩的痛苦和对子孙的持续依赖而发生的戏剧性的物理变化;但孩子还可以被辩证地看待,他是一个发生的自我意识的改变这样一种相对长久的现象;自我意识本身也注定要被克服,正如孩子最终要由于出生、成长和分居而被取代一样。

古代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辩证法的肯定、否定以及新生事物的诞生中所看到的東西,在他的哲学对话中成为可能;柏拉图让他的主要角色苏格拉底扮演理念——无论是成活的还是难产的——的助产婆(特别是在《菲多篇》和《泰阿泰德篇》中);而马克思在物质和精神的交换过程中变换了角色。对马克思来说,难产的是柏拉图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观点,这种观念认为,类存在物的超越“仅仅”需要那个物质世界,物质世界只是精神必须利用的外壳;事实远非如此,辩证的唯物主义是物质世界的被人性的历史。辩证唯物主义对精神—肉体二元论的重大超越是,前者能够提供后者所不能提供的东西,也即是说,一种形而上的或者观念的构架,在其中,我们既能说明形体的也能说明精神的东西,既能说明生态学的也能说明社会的東西,这些東西激活了类存在物的历史。回过来说,需求确实是发明之母,也是人类集体地从地上飞升到自由天国之母。